图书情报工作
第65卷 第7期 2021年4月

万华镜里的自画像:关于中国人文学者数字学术认知与需求的质性研究*

■ 肖鹏[1] 衣春波[2]

[1]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广州 510275 [2]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 上海 200062

摘 要:[目的/意义]从人文学者的角度出发,探讨人文学者如何看待数字人文,他们又如何被数字人文的浪潮所影响。通过对人文学者数字学术认知与数字学术需求的考察,为数字人文服务和系统设计奠定基础。[方法/过程]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文学、历史、哲学和艺术4个领域展开比较研究,并以访谈素材进行饱和度检验,构建起"认知-预判-担忧-需求与应对"的质性主线。[结果/结论]研究发现,不同领域人文学者对数字学术的认知并不完全相同,但对其影响的预判也存在共性之处,他们普遍认同数字化对人文的研究素材、研究方法、知识传播和研究问题都会产生一定影响;面对数字化浪潮,人文学者的担忧主要包括对数字学术研究深度的担忧、对学科主体地位的担忧和对技术环境下学术伦理问题的担忧;最后,人文学者在自身能力提升、数据、技术、科研评价体系方面存在许多需求,其中对"基础设施"和"数字项目"的需求最为迫切。

关键词:人文学者 数字学术认知 数字学术需求
分类号:G253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21.07.001

1 问题提出

"数字学术需求"是指研究者在数字学术崛起的背景下,因适应新兴学术环境和范式而产生的各类需要[1]。相比传统图书情报学(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LIS)视域中"信息需求"或"信息资源需求"的概念,"数字学术需求"所指向的范围更广,覆盖研究人员在数字学术环境中话语需求(在数字环境下实现观点输出、获得学术认同方面的需求)、探索需求(在数字环境下展开学术探索、构建新型问题意识的需求)、工具需求(对数字化学术工具的获得和利用需求)、资源需求(基本对应传统LIS领域对信息资源的需求)、素养需求(提升自身数字化素养的需求)和科普需求(接触和了解数字学术的需求)等。这一概念更为全面、也更为完整地描述了研究者在学术环境和范式转型的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虽然"数字学术需求"属于基础概念,可以面向所有领域的研究者,但这一概念最初是围绕"人文学者"而构建的。笔者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回归一个更为关键的议题:人文学者的数字学术需求是什么?或者说,人文学者有哪些数字学术需求?

尽管"数字学术需求"是一个刚刚出炉的概念,但关于人文学者学术行为的考察及其学术研究过程的分析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笔者在此前一篇文章中曾指出,当前对"人文学者学术行为的研究一般有两种理路:其一是从人文学者的'自画像'入手,其二则是借由其他学科的视域加以观照,此两者相辅相成……"[2]前者(所谓的"自画像视角")指的是由人文学者展开或发声的、关于自身学术行为和学术研究需要的文本,属于人文学者对个人学术需要的自我剖析与体悟,其优势在分析深度层面,劣势则在于此类表述可能存在"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缺憾。后者(所谓的"其他学科的视域",可称为"他画像视角")指的是由其他学科尤其是LIS领域对人文学者学术研究行为的考察,从早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技术赋能视阈下人文学者的数字学术需求及其图书馆服务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8CTQ006)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肖鹏(ORCID:0000-0002-6668-8122),副教授,博士;衣春波(ORCID:0000-0002-5058-7466),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E-mail:chunboyi@163.com。

收稿日期:2020-10-26 修回日期:2021-01-14 本文起止页码:4-14 本文责任编辑:徐健

年 S. Stone 对人文学者文献使用习惯的跟踪[3]，到近年 L. M. Given 等对人文学者数字研究工具的使用行为研究[4]皆可归入此列。相比人文学者的自我观照，其优势是摒除了人文学科固有思维惯性的干扰，可以从更为客观的视角展开论述，缺点则在于外部研究者对人文问题很多时候缺乏深刻的理解，研究结论较难引发人文学界的共鸣。笔者试图结合以上两项传统，采用质性研究方式，在 LIS 领域的视域和框架中，尽量多地采纳人文学者的公开话语和关键表达来呈现其数字学术需求。

2　研究综述

诚如上文所述，本文的研究综述分别从外界对人文学者的研究和人文学者对自身的观照两个角度展开，大致可称为"他画像"视角和"自画像"视角。

"他画像"视角下的研究主要源自 LIS 领域。从 20 世纪 80 年代，LIS 的相关学者就建立了关于人文学者信息需求、信息行为的研究传统。这些研究尽管追踪和记录了人文学者的需求转变，但其实这种转变在很长的时间里并不明显[5]。2007 年前后，S. Baruchson-Arbib 和 J. Bronstein 的工作颇受关注，他们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对以色列的犹太研究学者进行调研，最终发现诸如"对书本有较强偏好""习惯追踪引文""重视图书馆馆藏目录"等结论[6]。经由这些结论勾勒的人文学者形象，与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并没有本质区别。这一时期的人文学者已经开始使用数字资源、习惯于信息技术，数字资源的使用频率在提升、对数字学术的认同也在逐步加强，例如，在历史领域，数字档案馆藏已经成为历史学者的主要资源[7]；在艺术领域，e-Science 项目激发了艺术学者的热情，迫切希望与信息科学和计算机研究人员合作，合作突破人文数据的模糊性、不一致性等问题[8]；当某些人文学者意识到数字资源的价值，他们还坚持不懈地与各类型的技术和访问障碍做斗争，以获得其需要的数据[9]。但从总体上来看，他们对数字化的谨慎态度和行为惯性依然"肉眼可见"，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10－13]多次重申了类似的结论。

从"自画像"的角度来讲，人文学者虽然表达了对数字学术环境下的工具和资源的需要，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讨论的中心区聚焦于在更深层次，包括在数字人文范式形成过程中的话语需求、探索需求等[14－15]。当然，在这些"需求"的对立面，也有许多反对的声音，例如有学者就提出，将文学当作数据会失去文学本身丰富的意蕴，文学应该与数据截然对立[16]；亦有人认为在技术匿名情况下实证主义会抹去人文主义敏感性[17]。由于"自画像"的内容属于下文研讨的主轴，这里便不再赘述。

回顾以上两种研究路径，可以发现这两种话语关注了不同层面的数字学术需求。显然，LIS 视域下的需求考察主要从实践的角度出发，集中在工具需求、资源需求等层面，其结论与建议对开发数字工具、完善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服务策略有一定的帮助。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跳出"传统的 LIS 视域，从人文学者的角度来总结和考量需求问题。例如，倘若图书馆注意到人文学者在数字人文方面有构建新型理论话语的需求，那么它可以开发一项专门的服务策略，譬如以线上或线下研讨会的形式定期聚集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为理论观点的碰撞与交融提供交流的平台。进一步地，当前尽管有大量关于人文数据库的设计模型和设计思路，但人文学者如何看待这些设计观点？现在也有许多来自非人文领域的人文量化数据研究，专精于相关领域的人文学者如何看待这些量化工作，又如何判断它们的结论？对于这些问题，目前并无明确答案，可以说，本领域在"跳出"方面的工作仍有缺憾。

基于此，笔者确定了大致的研究思路：从人文学者的视角出发，考察其对数字学术或数字人文观点，再将这些观点纳入到 LIS 领域的框架下和语境中进行梳理，并进一步提炼为具体认知与需求，以便为数字人文服务和系统设计奠定基础。

3　研究设计与研究过程

3.1　研究设计

在分析人文学者的数字学术需求过程中主要面临两个问题，如何保证充分且完整地反映了人文学者对数字学术的观点？又如何保证我们所总结的需求代表了相对主流的意见？

当前针对人文学者的同类研究一般遵循以下路径：对人文学者进行深度访谈，立足扎根理论的规范流程展开质性分析工作，建立框架并展开理论饱和度检验。这样的方法取径本身并无问题，尤其通过饱和度检验，似乎能在某种程度上解决小样本质性调查的丰富性和代表性问题。但这种"自信"是非常危险的。一方面，小样本的理论饱和大样本的理论饱和可能意味着截然不同的事实，"滚雪球"方法带来的偏差危机[1]便是一个典型案例。此外，小样本的理论饱和偏

差在人文领域尤其明显,原因在于我们常常过于简单且不加考虑地使用“人文学者”这一名词。一般来讲,人文领域至少包含文、史、哲三个大学科,有时还涵盖艺术学——这些分科之间差异很大,甚至分科的子科目之间也存在很明显的认知间距,如此一来,一项针对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访谈本身恐怕很难代表“文学领域”的状况,但这样的“代表”却时常发生。另一方面,研究者在访谈过程中对受访者的提问方式、询问框架和话语引导,在分析过程中的相对主观化的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环节,很容易导致研究结果反映的并非主流观点,而更侧重呈现一些具有吸引力的偏激话语。

本研究某种程度上也属于小样本且主观化的研究,很难完全避免以上两个弊端。为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克服偏见,笔者对研究过程进行了精心的设计:首先,研究将调查文本和研究对象划分为 4 个领域(文学、历史、哲学和艺术),在结果和结论的阐述过程中也分别展开了单独考察和比较研究;其次,为了尽量反映主流的话语,将访谈所得的素材(26 份访谈记录)作为理论饱和度的验证素材,而作为主体的编码素材全部转从权威的人文社会科学媒体上获得。以上两种不同素材的结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小样本理论饱和带来的误差问题。

3.2　研究过程

笔者主要通过文献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式获得质性分析语料。研究首先梳理了学术媒体文章(仅限《中国社会科学报》和《光明日报(理论版)》)和分领域权威期刊(主要包括《历史研究》《哲学研究》《文学遗产》《文学评论》和《文艺研究》,并扩展到部分 CSSCI 期刊)两类信息源中主要由人文学者撰写的关于“数字人文”或“数字学术”的文章。在所获得的 100 余篇文献中,根据作者的重要性、期刊的分量,采用分别阅读、共同认定的方式选定了 41 篇核心文献,具体学科分布如表 1 所示:

表 1　数据来源列表

学科	学术媒体文章/篇	权威期刊/种
历史	8	1
哲学	1	7
文学	5	2
艺术学	2	4
跨学科	10	1

在此基础上,对 41 篇文章进行逐句(共计 3 415 句)分析,提取出涉及数字学术观点的重要语句,对重要语句中的无效词语进行删减,提炼出关键词语,将意义相同、意思相近的关键词语进行多次筛选、整理,形成初级概念,在此基础上进行开放式编码,最终整合出开放式代码 48 个,具体见表 2。

在此基础上又对 48 个开放式编码的潜在规律进行挖掘和概念连接,进一步获得 7 个主轴编码,包括数字化认知、数字危机、学科特质、学科影响、学科冲击、数字挑战和应对思路等。见表 3 中“主轴编码”的“主轴阶段”。

在选择性编码阶段,为了基于研究问题创建“故事线”和发展理论,文章对“主轴编码”进行修改、调整、重命名(名称的修改反映“选择阶段重命名”一列),其后又采用访谈素材进行饱和度检验。截止论文写作时,前期已经对 61 名人文学者进行了访谈工作,这些访谈主要涉及 6 方面内容,包括人文学者的主攻领域和研究选题、对数字技术的日常态度和学术态度、数字技术的应用情况、数字学术的认知情况、数字人文的学术想象及其他相关内容。在成型的访谈素材中,笔者挑选了来自文学、历史、哲学和艺术学者的 26 份材料作为语料,其中,文学、历史和哲学分别挑选了 7 名,艺术为 5 名。为保证素材的客观性和代表性,素材选取遵循两个原则:①同一领域内,最多只能选择 3 名对数字人文持有明显拥护心态的学者;②同一领域的学者对 3 个主轴编码的观点一般应当持有较大的差异性。经过检验,编码工作的饱和度良好。通过以上的一系列工作,最终构建起“认知 – 预判 – 担忧 – 需求与应对”的质性故事线。

4　研究结果

借助质性的路径,表 3 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1)在数字学术环境崛起、数字学术范式日益形成的背景下,不同领域的人文学者对数字学术的内涵和特征进行了观察与讨论,其中对于数字范式缺陷的反思格外受到关注(这一部分对应了“人文学者对数字学术的认知”的编码内容)。

(2)不管“缺陷”是否能够被弥补,从总体上来说,人文学界普遍认同数字学术对于文史哲和艺术等诸多领域将带来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是方法和材料层面的,更可能改变学科的本质特质(对应“人文学者对数字学术深远影响的预判”的编码内容)。

(3)客观来说,人文学者都承认数字学术将带来的巨大机遇,但对于数字学术介入人文领域之后的情

表 2　开放式编码结果

序号	开放式编码	初级概念
1	研究方法	优质的方法、丰富研究方法、提供了新范式、丰富古典文学研究维度、从“繁”至“简”
2	学科实用性	有力工具、有效工具、行之有效的崭新工具
3	交叉融合	学科交叉、渗透结合、跨学科、跨学科特征
4	量化分析	指标比较、定量统计模型、关联分析
5	物质体验	可视化、直观亲切的地图浏览、丰富视觉感受、交互体验、互动性
6	研究补充	协助复原 、赋予新生命、提供新途径
7	解释指引	策略指引、成功典范、强大解释力
8	研究思维	碎片化重组研究思维、开放与全过程研究思维、计算分析研究思维
9	材料获得性	极大便利、资料利用革命性变革、解放文献查找过程、获取障碍大大降低、被便捷地利用
10	自觉性	自觉融入大数据时代、自信和觉悟、自觉学习、自觉更新
11	技术辅助	利用新技术手段辅助研究、技术为辅助
12	方法变革	运用量化手段 、掌握科学方法 、构建“文学计量学”、交叉融合、交叉创新研究
13	技术问题	技术不够敏感、技术与方法上存在很大困难、技术缺失
14	责任担当	承担起时代责任、学者有责任和义务
15	学科冲击	越来越“教条化”、对真实历史形成巨大冲击力
16	主体地位	失去文学本身丰富的意蕴、文化的价值向度被严重剥落、降低人的主体地位、对社会关系的重构、共生关系脱节
17	机制支撑	建立相应的体制机制、建立科研立项新机制、设置更合理的学术奖励机制、建立学科建设新机制
18	资源权威	建立权威可靠更新及时的学术资源、数据连接必须合理和可靠
19	推动相关项目	构建大规模历史量化数据库、搭建创新平台
20	人文为本	人文之心、人文为本位、深厚学术史背景的思想建构
21	团队合作	研究机构应加强学术交流、多参与国际合作项目
22	服务社会	服务社会经济发展、起到巨大作用、推动重大现实问题
23	扩散传播	传播话语权迁移、传播变得便捷、国际化传播、更具穿透性、扩大传播
24	话语权冲击	学术权威难以形成、严重讹误、自由评论、网络“失语”
25	深度不足	多止步于概念套用、停留在资料永久保存阶段、留在检索方便上、查询工具
26	材料广泛	扩大历史资料范围、提供研究资源、提供数据基础、拓宽信息来源
27	指导和发现	挖掘新事实、产生新认识、挖掘文本中的脉络
28	认知态度	持观望态度、不属于主流学科、积极吸收和借鉴
29	研究成果	取得重要成就、重大突破
30	分析科学	科学性显著增强、遵循科学、精确性展示、避免主观化
31	研究参与	普通人参与、社会成员、非历史专业
32	社会热点性	新趋势、时代反映、热点之一、学术潮流
33	学科应用性	文献数据库建设、展开各类数字人文研究项目、应用价值高
34	数字化表示	保存研究材料、数字化文献、数字化保存
35	兼容困难	绝非简单叠加、与技术发展潮流脱节、缺乏适用性与人文关怀、过分关注技术分析、量化运用不够充分
36	评价制约	科研管理体系需更新、同行评审、晋升和任期等问题困扰 、世俗化学术评价标准
37	伦理冲击	个人隐私的泄漏与保护问题、版权失去强有力的监护、大数据伦理问题、数据滥用
38	数据意识	大数据意识、观念向 “数据化”转移
39	能力限制	向研究者提出了不断跟进的要求、给学者带来巨大挑战、难以适应研究方式的转换、观念转换的难度、颠覆思维惯例、认知困境
40	改变核心使命	目标会发生改变、重“术”轻“学”
41	学科地位	不能完全取代、相得益彰、不会改变研究本质、融合共生
42	学科理论性	理论(或信息)匮乏、复杂性科学、理论和定律
43	数据特点	数据丰富、几何级速度增长、前所未有的速度、规模巨大、种类繁杂、变化快速
44	缺乏高度	不能达到高度、没有大的问题意识、方向感薄弱
45	数据限制	线索有限、依赖二手数据、样本范围选择困难、数据资源不足、数据转化为研究数据存在难度
46	思维转变	观念上的突破、更新观念、与时俱进、调整自我惯习
47	学科变革性	创造性探索、革命性变革、机会与挑战、变革与创新
48	协作参与	协作越来越重要、合作参与、共同完成

表 3　主轴编码与选择性编码过程

选择性编码	主轴编码	开放式编码
人文学者对数字学术的认知	主轴阶段的概念：数字化认知 选择阶段重命名：对数字学术内涵的认知	研究补充、材料广泛、量化分析、解释指引、分析科学、指导和发现、数字化表示、认知态度、物质体验性
	主轴阶段的概念：数字危机 选择阶段重命名：对数字学术缺陷的认知	深度不足、缺乏高度、改变核心使命
人文学者对数字学术深远影响的预判	主轴阶段的概念：学科特质 选择阶段重命名：数字化对学科特质的影响	学科地位、社会热点性、学科变革性、学科实用性、学科应用性、学科理论性、交叉融合、数据特点
	主轴阶段的概念：学科影响 选择阶段重命名：数字化对学科其他层面的影响	研究方法、研究参与、研究思维、研究成果、材料获得性、服务社会、扩散传播、协作参与
人文学者对数字学术介入后果的担忧	主轴阶段的概念：学科冲击 选择阶段重命名：数字学术的深远影响	兼容困难、话语权冲击、学科冲击、主体地位、伦理冲击
人文学者的数字学术需求及其应对	主轴阶段的概念：应对思路 选择阶段重命名：明确应对方式的数字学术需求	推动相关项目、思维转变、数据意识、方法变革、人文为本、自觉性、技术辅助、机制支撑、资源权威、责任担当、团队合作
	主轴阶段的概念：数字挑战 选择阶段重命名：不明确应对方式的数字学术需求	技术问题、评价制约、能力限制、数据限制

形，他们更多表现为“担忧”而非“兴奋”。这种担忧尤其体现在方法的不兼容、话语权的旁落、学术伦理的变更等多个层面（对应“人文学者对数字学术介入后果的担忧”的编码内容）。

（4）尽管（1）到（3）的内容似乎并不直接响应本文最初提出的研究问题，但事实上，只有了解了（1）到（3）的背景，对人文学者的数字学术需求才能形成更为深刻的认识，才能找到更为彻底、深入的解决方案。而就人文学者自身的主观意识出发，其需求目前其实可以分为两种，有一种是他们已经有了明确应对方案的需求，例如在团队合作、方法变革等方面的需要；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些需求他们尚未有非常明确的解决思路，例如在数字成果的评价制约、数据获得的限制等层面（对应“人文学者的数字学术需求及其应对”的编码内容）。

下文将具体地结合媒体语料和访谈素材复述这一“故事线”。

4.1　人文学者对数字学术的认知及对其影响预判：单学科视角

尽管在整个“故事”中，历史、文学、哲学和艺术等不同领域的学者都持有不同的观点，但主要的分歧主要在（1）和（2），也就是人文学者对数字学术的认知及其对数字学术深远影响的预判这两个层面。因此，本节将重点探讨不同学科对这两个议题的观点差异。

4.1.1　历史领域

历史领域的语料或访谈的普遍认知是：数字学术将深刻影响历史学的方法、资料乃至于研究对象，对于这种影响是否会深入到学科特质层面则存在较大的分歧；整体上，他们认为带来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

从访谈素材中可以发现，历史学者对数字学术的认知，多数是在数字化古籍资源的建设和利用中获得的。在主流媒体或报道中，历史学者对数字学术态度表达也往往和古籍数字化的议题融合在一起，例如有学者在论述“大数据时代”对历史学的影响时，其论述即由“超大规模古籍数据库”出发，设想此类数据库的两个特点，即“超大规模的数据量，其中文献种类和内容都非常丰富，有更大的包容性……可以把更多更丰富的信息汇集在一起，可以获得更多、更全面、更准确的资料”和“有更多技术层面的支持……如对古籍的自动识别、自动标点、自动排版、智能检索、智能分析，可实现多种数据格式的转换和输出，可以满足文、史、哲、经各学科研究所提出的各种特殊需要，更能适应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高级需要。”[18] 历史学者敏感地把握到数字学术对史料的影响，并对后续影响做出思考。例如，数字时代的史料变革首先可能改变历史学的研究对象，“长期以来，由于既有文献资料的限制，人们研究历史时，总是以社会精英人物为主要对象，这就难以避免使社会精英成为历史活动的主体。……大数据使草根大众日常的、琐碎的巨量历史资料可以被便捷地利用，这就使历史活动中的草根大众鲜活起来，具体起来，成为真实的存在”[19]；也会影响到研究的理路，如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认为：“大数据将量化研究广泛引入各种历史问题研究之中”[19]；最终将影响到整个历史学科，“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构建大规模历史数据库并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必然促使他们从传统的文献解释研究模式向信息数据收集、数据挖掘、数据库建设和记录分析与写作模式转变。这种研究方式的大转变意义重大。”[20]

尽管如此，根据语料的梳理可以看出，总体上历史领域并不认为数字学术会改变历史学科特质，例如清

华大学熊金武教授着眼于量化研究对定性方法的补充功能,"对于史学而言,量化研究不仅可以对一些信念和重大命题予以验证,而且具有积累和延续性,可以对定性研究予以补充,得到新发现,形成新理论。"[21]类似的表述还有很多。或许正因为对历史学科内涵在数字时代不会动摇的信心,几乎所有的历史语料对数字化都保持着积极的态度,高度关注新研究范式对历史学的可能机遇,甚至认为数字学术的路径将推动历史学重新走向"求是型学术"的愿景[22]。

4.1.2 哲学领域

哲学领域的语料或访谈的普遍认知是:数字学术对哲学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数字学术将彻底变革哲学的学科特质——尽管这一观点和历史学者有很大的不同,但哲学领域同样认为数字学术的影响是积极的、正面的。

从已分析的语料来看,哲学领域之所以认为数字学术会深刻改变哲学的传统学科特质,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①对世界观的颠覆。例如有学者认为,在大数据时代"世界的一切关系皆可用数据来表征,一切活动都会留下数据足迹,万物皆可被数据化,世界就是一个数据化的世界,世界的本质就是数据。"[23]因此"也就是说只要收集到的数据粒度足够精细,并且能够从多维度收集数据,那么这些数据是足以能够表达现象的。"[24]这对于构建在传统世界观基础上的哲学知识体系的冲击是巨大。②对认知和方法的变革。"大数据对传统还原论进行了深刻批判……具体来说,大数据通过数据化的整体论,实现了还原论与整体论的融贯;通过承认复杂的多样性突出了科学知识的语境性和地方性;通过强调事物的相关性来凸显事实的存在性比因果性更重要。"[23]可以说,测量手段的改变将重新定义哲学探索世界的方式,"大数据用相关性补充了传统认识论对因果性的偏执,用数据挖掘补充了科学知识的生产手段,用数据规律补充了单一的因果规律,实现了唯理论和经验论的数据化统一,形成了全新的大数据认识论。"[23]

尽管如此,学者们普遍认为大数据时代并未否认哲学研究的关键地基即因果逻辑,如齐磊磊所指出的,"相关性是比因果关系更广泛的概念……大数据经验主义消除因果关系的看法是片面的。大数据表面上看没有因果律,或不问因果关系,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比如商品销售中尿布与啤酒之间具有正相关性,这种正相关性在大数据经验主义者们看来只是一种相关关系。但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这种正相关性实际上包含着一种普遍的因果关系。"[25]在这样的背景下,哲学领域在数字学术时代有充分的行动和发展空间。

4.1.3 文学领域

相比历史和哲学领域,数字人文在文学领域的出现时间更早,应用范围更为深入,文学领域对数字学术的认知呈现出高度的内部异质性,对于数字化技术的态度比较中立,算不得积极欢迎,也并未表出过分的排斥。

在数字学术的可能产生影响的方方面面,历史和哲学的文章往往出现"各打五十大板"的话语表述,既论述数字化的优点,也表达其可能的缺陷,最后又以积极、正面的讨论为结束。但在文学领域则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抗衡"(还没有达到"反对"程度)声音,例如"定量分析通过精确的数量统计,使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从模糊性描述向精确性展示转变,增强了文学研究的科学性……文学不应该是冷冰冰的数字,文学应该是一种诗意的内心的感受,……文学研究离不开研究者对文学语言的感受力,量化分析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应该和文学感受力互相配合……定量分析有它的适用领域,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以批评为核心的文学研究方法。盲目地采用量化手段,有时也是隔靴搔痒,未必能解决真正的文学史问题。"[26]

此外,文学领域的独特性还体现在:相比历史和哲学研究,文学研究的对象及"文学"本身,其创造、流动和消费正在深入地经历数字化的过程,即"网络文学"或"数字文学"的兴起。有学者认为,"开展数字文学研究,既是对半个多世纪以来东西方数字文学生产实践的理论回应,也是丰富和建设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现实需要。"[27]文学在数字人文研究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相关学者对数字学术的讨论可能并不多,但他们已经基于明确的问题意识和丰富的对象素材展开了大量的实践工作。

4.1.4 艺术领域

艺术发展与科技进步往往如影随形,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融入艺术领域,并且凭借"表现多样化、制作高效化以及艺术大众化"[28]等特点,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数字艺术创作。"数字技术带来的不仅仅是创作媒介和手段的革新,也给创作思路带来新思考……今天的艺术家已经不仅仅是采用新媒体这样的简单形式,他们从创作理念到创作思想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这将成为新的时代最重要的创作艺术表达。"[29]可以说,相比传统的"文史哲",艺术领域学者对数字学术的拥抱最为积极和彻底,他们的观

点和实践令人印象深刻。

与文学领域类似,艺术研究的对象"艺术"本身有非常充分的数字化实践。在数字化的背景下,通过全息投影、虚拟环境等技术的运用,产生了新兴"数字艺术","数字艺术虽然相较于传统艺术具有优势,但是并不代表对传统艺术的战胜,新生的媒体艺术与传统艺术应是相互影响、共同进步的"[28],"二者会变为一种融合共生的状态"[29],而且"数字艺术"和"传统艺术"的契合度相当之高,"过渡"也比较流畅,原因可能在于,"数字媒体技术虽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取代传统艺术的艺术语言,但单纯的数字媒体技术家并不是数字媒体艺术家。只有经过传统艺术的熏陶,具备良好的审美能力,掌握数字技术,才能推动艺术走向更高的水平。"[28]相应地,艺术领域的学者对数字学术的态度也非常积极,强调未来艺术研究"要着眼于理论体系、研究理路的宏观建构和审视,又要致力于微观、具体问题,从多种角度进行深入细致研究,并与海外成果有机融合,形成一套独特的思想方法和理论体系。"[30]

4.2 人文学者对数字学术的认知及对其影响预判:综合视角

4.1 小节从单一学科的角度探讨了人文学者对数字学术的认知及对其影响预判,更多呈现的是"差异",而本节则致力于表达"共性"。从共同性的角度来讲,人文学者对数字学术的认知主要体现在研究素材、研究方法、传播形态和研究问题等层面,有很多判断是基本一致的。

4.2.1 对研究素材的认知

几乎所有的人文学者都提及和论述到数字时代研究素材(或"研究资料")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有两点:①总量快速增加,如 C. Gregory 的"百万图书的挑战"不止一次被人文学者所引用,"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在自身研究领域都面临大量文献资料的处理,这些文献资料的数量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阅读能力所能处理的范畴,因而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也将不得不借助计算机来处理完成相关文献资料,即'百万图书的挑战(million books challenge)'问题"[31];②素材的类型也在改变,如李中清教授认为"大量零散但又有一定体系的史料扩展了史学研究的材料范围,大规模的数据化历史资料平台,也为整个学术界提供了更丰富、灵活而有效的研究资源。"[32]

4.2.2 对研究方法的认知

在本研究的语料中,"量化研究"或"量化分析"及相关名词的出现频率很高,这意味着人文学者普遍关注到方法论的改变,以量化分析延伸出来的相关性思维也逐渐被接受,尤其引起了哲学思维的重大变革。其核心在于"最大化地量化数值之间的数理关系,一个数据值的增加很有可能引起另一数据值的增加"[33],某个变量的变化引起其他变量的变化,从而看到彼此之间的相关性,注重由相关关系发现的客观存在事实,而不寻求因果关系(即为什么会存在),这与传统因果解释模式截然不同。然而,在历史学、文学、艺术学领域,多位学者认为"量化分析方法并不是取代传统研究方法"[26,28,34],而是更关注数据背后的客观信息,以此补充人文研究的"科学性"。

4.2.3 对知识传播的认知

数字媒体的出现带来了"传播话语权的迁移"[35],在让知识传播更为高效的同时,也导致"媒介身份和教育身份的分离,知识传播的话语权逐步从传统学者移至媒介巨头,尤其是以电视、网络等现代传播手段为代表的传媒机构。"[35]

人文学者同样认识到数字学术对人文学科的知识传播产生的重大影响。知识的分享、交流和传递更为迅速和便捷,人文学者使用 E-mail、微信等网络平台进行学术交流已成为日常方式,运用数字技术、多媒体手段进行教学,让课堂变得更具互动性,美国佐治亚大学历史学家 S. Claudio 称"'在线互动''可视'等方式为传统资料赋予了新的生命,这种展现历史的方式比讲座更有吸引力,也让他有了更多的受众……如今,书籍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在下降,年轻人更青睐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而数字历史恰好能在这种环境下提供一种历史与公众联系的新途径。读书时我们在消费信息,而访问数字化网站时,我们可通过搜索、归类和创建等操作,与信息进行互动和交流。"[36]

4.2.4 对研究问题的认知

数字学术可能会更好地带动人文研究问题的更新,中国的人文学者尤其关注如何利用"数字人文"的契机,推动中国本土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在历史学领域,有学者认为将文化展示与数字技术结合,可彰显其文化与经济价值,如敦煌莫高窟,"以敦煌元素与内涵为核心、以数字化产业资源为依托的文物与文化产业链条创新模式,实现了古典文化传统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激活了其在新时期的社会经济与文化价值。"[37]

4.3 人文学者对数字学术介入后果的担忧

人文学者对数字化介入学术研究领域之后的影响表现出相当明显的担忧。这种担忧从"赋能理论"的

角度来看，实则是一种"失能"的表现，应该被数字人文的研究者所重视——如果没有办法降低人文学者的担忧，数字人文的推进可能会遭遇很大的困难。

4.3.1 对深入开展数字学术研究的担忧

虽然量化方法和数据意识越来越多地被人文学者所重视，但相应的忧虑也随之出现。台湾大学的项洁教授认为，"要想在大数据时代走出一条数字技术与人类思维的兼容之路，在反思的基础上进行学术创新绝非易事……文本挖掘出的线索是有限的，统计取样不可避免存在不够全面等问题。此时，学者本身的学术训练显得尤为重要。"[38]创新的苦楚和困难在史学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大规模古籍数据库的建立简化了资料查阅，但有学者提出，"史学家对数据库建设的认知大多还停留在资料永久保存阶段，以文献和数据检索为主要目的，数据库的可量化研究以及由此带来的方法转变还未曾涉及，这也造成一些大规模历史数据库被构建却无法得到很好利用的尴尬"[20]；虽然"经过了多年的数字化进程，但是仍然把数字化文献当作方便查询的'书'来使用，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数据'而深挖其潜在的各种价值。显然，数据库的应用还处于相当初级的阶段，远远落后于网络技术及其所带来的观念变革。"[39]类似的，在艺术学领域，数字艺术"多止步于概念套用"[30]以及类似的问题更是屡见不鲜。

4.3.2 对学科主体地位受到冲击的担忧

数字技术与人文学科的融合虽然产生了很多新的研究方向，为人文提供了新的空间，但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人文学科的主体地位很容易受到冲击，"大数据重构了文化传播的空间形态，也打破了原有的话语体系平衡，缔造出新的话语权分布。"[35]

一位学者的说法颇具代表性，"大数据已经刺激了大批非历史专业的人们参与到历史研究、历史书写队伍中来，他们没有受过历史研究的基本训练，但又各有自己专业之所长，常常可以发专业史家之所未发，当然，也会使历史记述与历史解读更加多元多样，乃至出现各种一般不应有的严重讹误。大数据使得千千万万社会成员可以很方便地对历史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对所有与历史相关的著作及其他成果自由进行评论，并迅速扩散、传播，对真实历史、专家之学、庙堂之学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19]除了对人文学科主体地位的担忧之外，部分人文学科已经受到了数字时代的冲击，例如艺术批评领域。数字媒介给艺术批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冲击，"绝大多数艺术批评家仍只愿意在传统批评体制中对一些经典艺术作品进行反复阐释与分析，而较少到网络空间中去发言，对网络空间中的艺术现象普遍'失语'……艺术批评与艺术作品之间的共生关系出现了严重的脱节。"[40]有学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关键原因在于互联网之于艺术的"去权力化"，使得很多网络作品不需要权威评论也能"走红"，这"在根本上造成了批评家权力的衰微与理想自我的幻灭"[40]。

4.3.3 对新兴环境中权益与隐私的担忧

新兴的数字学术环境在为研究人员带来交流与分享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伦理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权益保护、数据隐私问题。以数据隐私为例，网络的开放共享与数据的交叉使用会产生隐私泄露问题。"人们在享受大数据时代的便捷和快速的同时，也时刻被暴露在'第三只眼'的监视之下，从而引发隐私保护的危机。"[19]此外，"数据的伪造和篡改等科学不端行为直接威胁着科研活动的正常运行，产生不端行为的根源和能否规避不端行为，成为目前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41]

4.4 人文学者的数字学术需求及其应对

4.1 到 4.3 小节尽管不是直接回答人文学者有何数字学术需求的问题，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不可或缺的。笔者强调质性研究是一个"故事"，原因就在于直接听到"结局"的"故事"毫无意义，唯其将"过程"与"结局"放在一起，"故事"的意义和内涵才得以现象。对于本文来讲同样如此。例如，在下文的 4.4.2 中会提到人文学者在数字能力提升方面的需求。如果直接给图书馆这么一个答案，也许图书馆只能粗糙地安排相应的能力提升计划或素养培训方案。但如果结合 4.1 中对不同领域学者的考察，图书馆或相关机构的设计会更具导向性和针对性。

4.4.1 有明确诉求方向的数字学术需求

从此次研究的结果来看，人文学者非常清楚，要真正实现数字学术转型、建立数字学术的研究能力，他们需要得到外界的帮助。在某些方面，人文学者已经有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诉求和可供参考的解决方案，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对"基础设施"和"数字项目"的呼吁。

一方面，"基础设施"的提法在图情领域更为流行，但人文学者对于古籍数据库或大型数据库的呼吁，其实更接近于"基础设施"的概念。基础设施是指在数字环境下开展人文研究所必须的基本条件，包括与人文研究相关的所有文献、数据、相关软件工具以及提供分析处理、资源组织、开放存取、可视化工具等信息服务等[42]。要推动数字时代人文学者研究范式的转

变，必须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他们提供技术基础。但“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或者说很多时候并非技术问题，“第一，要有观念上的突破……第二，要有体制上的变革。单纯的商业模式或完全的政府立项，都难以完成这一巨大的文化工程……第三，要有政策上的支撑。大型古籍数据库建设涉及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处理国家和个人、局部与全局、保护与创新的关系，需要有关部门制订相应政策，扶持和鼓励这一产业的健康发展。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需要产生伟大的作品，创造伟大的成果”[18]。

另一方面，人文学者们认识到，要真正参与到数字人文的浪潮之中，必须重视以落地和实在的“项目”，“人文领域的学者应该扩大视野，多利用新技术手段辅助研究，多参与国际合作项目”[43]，并且要有自信和觉悟，“向全世界展示更多的中国成就和经验”[32]。在推动数字项目落地时，可以“以少数发展起来的平台为典型，搭建创新平台”[44]。而让人文学者更加认识到的是，“项目”是数字学术需求的载体，最重要的是人文学者应该“承担起自己的时代责任，善于运用大数据时代提供的世界性知识和世界性视野，真正跨越学科藩篱，组成多学科研究团队”[19]，以实现数字技术与社会科学的融合发展。

4.4.2 尚未有明确诉求方向的数字学术需求

与此同时，人文学者还有其他的一些数字学术需求，其自身并未明确具体的解决方案和诉求方向，具体包括：

（1）数字思维和能力的限制。推动人文学者从传统研究观通往复合的研究视域以及加深对数字学术范式的理解，是数字人文发展中的一个关键挑战。“大数据研究方法不同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观测与实验方法，导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一时难以适应这种研究方式的转换。”[44]更进一步来讲，“过去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习惯进行定性研究、概念分析、理论推演，在量化方面的运用不够充分，对于大数据分析技术还不够敏感。”[44]如何帮助人文学者在心态和能力上“适应转换”，将是数字人文生态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2）数据获取与处理的制约。在大数据时代，数据膨胀与数据利用不足是人文学者需要应对的重要议题。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各类信息和数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并形成了万亿级别的数据集合，然而人文社科领域，数据利用率仍然很低。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段伟文所说，“大数据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所需要的数据资源不足，如何将各种经济、管理与治理领域的数据转化为适合研究的数据还存在一定的难度，对数据的采集与使用也尚无对应的法律法规可依。”[44]此外，在具体研究中，“文本挖掘出的线索是有限的，统计取样不可避免存在不够全面等问题”[38]，“由于文学研究的量化分析起步较晚，很多时候不得不依赖二手数据，样本范围的选择比较困难，需格外斟酌”[26]。

（3）传统学术评价体制与数字学术评价制度的潜在冲突。中山大学钟明华教授认为，数字学术带来的“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使两种不同性质的学科在科研目标、研究方法和评价机制上接轨。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运用大数据时，技术逻辑追逐‘数据红利’最大化与文化逻辑讲求数据文化价值、个人主体性实现，两种逻辑的碰撞与融合问题需要考量。在评价标准上，大数据技术主要采用计量测算的方式。难以量化的哲学社会科学能否完全按照这种评估模式操作存在一定的不可预测性。”[44]显然，人文学者在应对数字人文浪潮的同时，同样需要科研评价体系的及时更新应对，尤其在历史学领域，“数字历史研究面临着同行评审、晋升和任期等问题的困扰，该由谁来评估数字历史项目的成果、如何评估，从事数字历史研究的学者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获得晋升等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很多时候，历史学家渴望多做实验，许多大学也纷纷建立数字中心，但学术界的职业发展体系、奖惩机制等却没有做出相应的变化，这与未来数字历史发展的需求相悖。”[36]

5 结语

笔者通过一项质性研究工作梳理出一条人文学者与数字学术互动的“故事线”，通过对人文学者的数字学术观点进行分析，探讨了人文学者的数字学术需求。研究思路既有别于 LIS 传统下的“他画像”，也非人文传统下的“自画像”，而是在立足交叉视域的“万华镜”对多副成型“自画像”展开重新排比、梳理与分析，以此逼近人文学者的真实需求。

通过此项研究发现：①不同领域人文学者对数字学术的认知其实并不完全相同，例如文学领域学者对于数字化的观点，就有与历史、文学和艺术领域学者非常明显的不同之处，有的时候，这些差异性是构建有针对性、适用性的数字人文服务的关键；②人文学者对数字学术的认知和对其影响的预判也有共性之处，即普遍认同数字化对人文的研究素材、研究方法、知识传播

和研究问题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③但与此同时，上述影响带来了不少担忧，包括对数字学术研究深度的担忧、对学科主体地位的担忧和对技术环境下学术伦理问题的担忧；④最后，人文学者在自身能力提升、数据、技术、科研评价体系方面存在许多需求，他们本身也认识到了这些需求的存在，并针对其中的某些需求给出了明确的解决方案——虽然并不确定这些方案在图书馆或信息技术的实践中是否应当获得采纳，但毋庸置疑的是，如果连这些"提案"都不了解，必然会影响跨学科的对话——对于另外的一些需求，人文学者尚未有非常明确的解难思路，而这些方面恰是值得我们发力的所在。

参考文献：

[1] 肖鹏. 从"营造生态"到"需求驱动"：学术图书馆如何满足人文学者的数字学术需求[J]. 农业图书情报学报,2020,32(9):50－57.
[2] 肖鹏,姚楚晖. 走向数字时代的人文学者：泛 LIS 视域下的进展与反思[J]. 文献与数据学报,2019,1(3):18－25.
[3] STONE S. Humanities scholars: information needs and uses[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1982, 38(4): 292－313.
[4] GIVEN L M, WILLSON 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humanities scholar: documenting digital research practices[J].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8, 69(6): 807－819.
[5] DAHL C. PDA and the humanities assessing the fit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he literature on humanists and e-resources[J]. Electronic library, 2013, 31(6): 745－752.
[6] BRONSTEIN J, BARUCHSON-ARBIB S. The application of cost-benefit and least effort theories in studies of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of humanities scholars: the case of jewish studies scholars in Israel[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2008, 34(2): 131－144.
[7] SINN D. Impact of digital archival collections on historical research[J].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2012, 63(8):1521－1537.
[8] BLANKE T, HEDGES M, DUNN S. Arts and humanities e-science-current practices and future challenges[J]. Future generation computer systems, 2009, 25(4):474－480.
[9] WARWICK C, TERRAS M, HUNTINGTON P, et al. If you build it will they come? the lairah study: quantifying the use of online resources in the arts and humanities through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user log data[J].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 2007 (23): 85－102.
[10] HEAD A J. Information literacy from the trenches: how do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majors conduct academic research? [J].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2008, 69(5):427－446.
[11] UCAK N O. Information use in art: a citation analysis of sources used in art theses in turkey[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2011, 37(1): 77－81.
[12] 邱子恒. 中文系教师信息行为之研究：以辅仁大学为例[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1,37(2):61－74.
[13] Al-SHBOUL M K, ABRIZAH A. Information needs: developing personas of humanities scholars[J]. 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2014,40(5): 500－509.
[14] CLEMENT T E, CARTER D. Connec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in digital humanities information work[J].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2017, 68(6): 1385－1396.
[15] GOTTSCHALL J.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 new humanitie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16] MARCHE S. Literature is not data: against digital humanities[EB/OL]. [2020－10－08].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literature-is-not-data-against-digital-humanities.
[17] EYERS T. The perils of the "digital humanities": new positivisms and the fate of literary theory[J]. Postmodern culture, 2013, 23(2):e38.
[18] 杜晓勤. 国学大数据时代来了[N]. 光明日报,2013－09－16(15).
[19] 姜义华. 大数据催生史学大变革[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4－29(B05).
[20] 梁晨,董浩,李中清. 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J]. 历史研究,2015(2):113－128,191－192.
[21] 熊金武. 量化研究成为史学发展新趋势[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08－28(A05).
[22] 梁晨. 大数据时代历史研究新方法[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6－03(5).
[23] 黄欣荣. 大数据时代的哲学变革[N]. 光明日报,2014－12－03(15).
[24] 戴潘. 基于大数据的科学研究范式的哲学研究[J]. 哲学动态,2016(9):105－109.
[25] 齐磊磊. 大数据经验主义——如何看待理论、因果与规律[J]. 哲学动态,2015(7):89－95.
[26] 张杰. 文学量化研究利弊参半[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10－10(2).
[27] 单小曦. 数字文学研究：回应数字时代的文学实践[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6－15(A04).
[28] 鲁雯. 数字媒体艺术的跨学科趋势[J]. 文艺研究,2011(3):152－153.
[29] 张云. 数字艺术将与传统艺术融合共生[N]. 光明日报,2019－01－17(7).
[30] 何志钧. 打造数字美学研究的中国学派[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12－03(4).
[31] 孙建军. 大数据时代人文社会科学如何发展[N]. 光明日报,2014－07－07(11).
[32] 雷家琼. 构建量化数据库 算出更精确的历史[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6－30(A12).

[33] 段虹,徐苗苗. 论大数据分析与认知模式的重构[J]. 哲学研究,2016(2):105-109,129.
[34] 陈志武. 量化历史研究的过去与未来[J]. 清史研究,2016(4):1-16.
[35] 徐从辉. 大数据时代:重构文化空间的人文向度[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3-02(A04).
[36] 杨敏. 数字历史:让历史与公众有更多互动[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10-08(A03).
[37] 胡冰. 数字敦煌:新时期文化遗产保护新路径[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11-29(7).
[38] 王广禄. 数字人文促进方法论革新[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07-05(2).
[39] 郑永晓. 加快"数字化"向"数据化"转变——"大数据"、"云计算"理论与古典文学研究[J]. 文学遗产,2014(6):141-148.
[40] 黎杨全. 数字时代艺术批评的空间转向[J]. 民族艺术,2013(2):54-58.
[41] 刘红,胡新和. 数据哲学构建的初步探析[J]. 哲学动态,2012(12):82-88.
[42] 刘炜,谢蓉,张磊,等. 面向人文研究的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6,42(5):29-39.
[43] 张小溪. 数字技术介入人文研究成趋势[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5-30(A03).
[44] 孙美娟. 大数据研究助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07-09(1).

作者贡献说明:
肖鹏:论文选题与构思、大纲拟定、指导数据收集与分析、论文撰写与修改;
衣春波:文献整理、数据收集与分析。

Self Portrait in the Mirror: A Qualitative Study of the Digital Scholarship Cognition and Needs of Chinese Humanists Scholars

Xiao Peng[1] Yi Chunbo[2]
[1]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2] 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ties scholars, this paper discussed how humanities scholars viewed Digital Humanities and how they were influenced by the wave of Digital Humanities.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humanities scholars' digital scholarship cognition and digital scholarship needs, it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digital humanistic service and system design. [**Method/process**] Us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his paper made a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four fields of literature, history, philosophy and art, and conducted saturation test with interview materials to construct the qualitative main line of "cognition-prediction-anxiety-demand and response". [**Result/conclusion**] It's found that humanists scholars in different fields do not have the same cognition of digital scholarship, but their prediction of its influence also has something in common. They generally agree that digitalization has some influence on the research materials, research methods,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and research problems of humanities. In the face of the digital wave, the concerns of humanities scholars mainly include the depth of digital scholarship research, the subject status of humanities and academic ethics in the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 Finally, there are many needs for humanities scholars in terms of capacity improvement, data,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evaluation system, among which the most urgent needs are "infrastructure" and "digital project".

Keywords: humanities scholars digital scholarship cognition digital scholarship needs